

SHUIE XINWEN
明 天 传 播 学 丛 书
CHUANBOSHI

传播符号学

余志鸿\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明天传播学丛书

传 播 符 号 学

余志鸿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语言学原理将符号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传播学,颇多独立见解和创新观点。书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具体的事例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符号学的创建和贡献、符号中的学问、符号原理和结构系统及其传播功能等,指出没有传播符号也就没有传播的互动和传播价值的体现。

本书可作为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符号学/余志鸿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明天传播学丛书)

ISBN 978-7-313-04742-7

I . 传… II . 余… III . 传播学-符号学 IV . G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048 号

传 播 符 号 学

余志鸿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96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50

ISBN 978-7-313-04742-7/G · 943 定价: 18.00 元

明天传播学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甘惜分 丁淦林

主编 金冠军 戴元光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柏铨 刘卫东 刘建明 陈力丹

陈先元 张天蔚 张咏华 邵培仁

单 波 郑 涵 金冠军 郁金豹

钟德津 郭镇之 顾孝华 黄 炜

崔保国 童 兵 董天策 戴元光

序

虽然人类的传播活动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虽然人类对自己的传播行为的研究从人类有传播活动开始就未停止过，虽然人类对自己的传播行为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但中国人对传播的探索和认识也许是最早和最深刻的，正如传播学大师宣伟伯教授描绘的：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播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

著名传播学者、传播学中国化的强有力推动者余也鲁教授也深刻地指出：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对传播理论与实际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教人诧异。也许像刚刚说过的，传播行为太普遍，反而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近 20 年来，由于通信与交通工具的发达，人际与国际接触频度的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现代传播工具的深入家庭，因此传播活动所形成的问题，以及更多与更频繁的传播需要，促成了现代对这种基本活动本身的注意，开始有了从不同角度与不同侧重点来进行传播研究。

这套丛书是又一次探索，是从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对传播学进行的综合探索，以找寻到一个出发点，一个研究的方向与范畴。

明天传播学丛书编委会
2000 年 5 月

前　　言

我是从语言学研究进入到传播学和传播符号学领域研究的。喜读一些文学作品,每吟咏唐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王维),仿佛置身于一个具有生命的自然界,风雨冰雪,日月山水,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都是能爱能恨、敢说敢想的“人”。于是,我渐渐跳脱“明月”“风雨”“梧桐”“桃花”“鸳鸯”“山水”这些词语的直指意义,发现只是一个个带生命的符号,联结着作者富有强烈情感的心灵,从而发现语言不仅仅指示客体事物,更是人类心理和思想的代码。

从儿童时代到步入成年,我从识字开始,学习各种知识,也从生活的经验中学习社会知识。在我“知天命”之际,真实地回忆自己的所谓“知识”,才真正感悟到经验知识是如此的微薄,我的“知识”几乎都在自己的“语言”中。特别是我们的母语——汉语汉字,无论其音韵的和谐美、文字的形象美,提供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形成了许多语言外的“知识”。这也引起我对什么是“知识”的思考。人类的知识,按获取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感觉的知识和思维的知识,前一方式获得并得到人们经验认同的一般称之为“常识”,后一方式获得并经过现实验证的一般称之为“科学”。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都必须通过“符号”做中介,才能传播,才能成为社会的共享财富。人类所有的知识中,最具有共享性的是“语言”知识。这里不是指“语言”这个东西自身的知识,而是指“语言”承载和传递的知识,即“语言”的每个单位里蕴涵着的人类认知世界的知识,整个“语言”系统便是整个人类的全部知识。没有被人类认知的世界的那部分,没有语言化,就不是“知识”,或者说它们在人类的“知识”之外,那么它也就在“语言”系统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全部;人类的一切“知识”正是靠着“语言”的包装而进入人类心灵的。

语言不仅是知识的包装,也是借以表达知识的唯一工具。这样,人类的语言担当了多重角色,它既是知识的代码,知识的包装,又是知识的传播手段。说到语言,自然就归结到“词”。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词”都有实指的对象,具有实指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通常都“先验”地被规定——以定义的方式记载在词典里,其定义方式又是用别的“词”来规定它。我们意外地发现,原来人类的“知识”竟然是一个无限博大的循环:甲词被乙词定义;乙词被丙词定义,丙词又被丁词定义……乃至

最后被定义的词回过来去给未定义的词下定义。人们认为这个过程获得的“知识”是科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给“词”的解释往往并非如此。比如“雨”在词典中定义为“空中水蒸气遇冷变成的落向地面的水滴”，对缺乏“雨”知识的人绝对不会这样认识，他们只有切身感觉到的天上落下来的水滴——倾盆大雨或者毛毛细雨；而且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对同一事物引发的意象是不一样的，也会对“雨”的意义出现不同理解。同样的道理，比如对“冰”的理解，中国南方和北方就不同，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几乎看不到自然形态的冰，当然难以接受“冰”的概念，所以北方人说的“冰棍儿”或“冰棒”，广州人就叫它“雪条”或“雪糕”了，因为广州人认为“冰”和“雪”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常识。

这样，语言表达的知识就表现得很不同：一种是表达科学的知识，在那里力求把语言变成不带任何个人因素的东西，并且使语言中的每个成分——“词”成为高度抽象的、远离感官世界的可定义物，因为它离感官世界越远，你对世界的把握就越准确，你的知识就越从常识走近科学。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越是接近逻辑上的抽象，那么我们认识上不可避免的差别就会变得越小，一致性越强。这一点很重要，它使我们排除了对任何“词”实指意义的依赖，消除了存在物对“时间”和“空间”为本身目标的依托。比如“你”这个词，每个人在使用中具有某种实指意义，总是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某个个人，但是在“语言”系统中存在的“你”，则既不是指张三，也不是指李四，而是直指话语交谈中的对方（不管这个人是谁）。于是，我们把语言分为带有个人认知局限的具体语言和属于全社会共享的非经验性的抽象语言。

我们对语言的这种分析，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人们在现实中使用的语言，都立足于个人的感觉知识——语言常识；而个人感觉是我们全部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又使我们进入深层的思维，使我们远离实体事物的直接意象而达到事物的本质，获得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以往我们还没有能在最广泛基础上——所有人所共有的、超越任何个人感觉——来确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传播符号学。

我们知道，语言始终被分解为双重“人格”，其一属于使用者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另一属于全社会共有的知识和理念。但是语言又必须体现双重价值，其一是传递信息表达意义，另一是描写事实表达客体事象。同时我们发现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抽象的，它由物质的可听感声音或可视觉文字组成，又由无法让人们直接感知的意义组成。我们准备在对语言的这一基本认识基础上展开传播符号学的论述。传播学的符号跟语言符号有典型的相似性，但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适用性。传播符号跟语言一样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价值，也具有物质性的能指和抽象性的所指，但它同时跟语言不同，它少了一些语言的个人经验和情感，既具有跟物质世界客体事象联系的实指性又具有远离客体世界而跟意识形态发生联系的意指性。

所以,传播符号学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传播学,也适用于语言学,更广泛适用于包括艺术和科学的一切学科的研究。符号学产生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由皮尔斯、莫里斯、巴尔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洛特曼等符号学大师的补充修正、发扬和发展,其理论和方法越来越精细,并被普遍运用于传播学研究。

当我们在分析符号系统时,发现它跟天文学上的太阳系和物理学上分子—原子结构的分析十分相似。目前跟地球人最有直接关系的是太阳系。太阳系是由太阳、行星及其卫星、小行星、彗星、流星和行星际物质构成的天体系统。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其外层是八个大行星,还有数以万计所占微乎其微的小行星;太阳的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 99.8%。八大行星及无数小行星沿着自己的轨道万古不息地绕太阳运转着,同时,太阳又慷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太阳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促使他们不停地发展和演变。这是宏观的天文世界的基本结构。在微观世界,世上所有物质都由细小的原子构成,而每粒原子有一个被不超过八个电子包围着的原子核。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原子核内含不带电荷的中子及带正电荷的质子,而带负电荷的电子则沿轨道环绕原子核运行,情况就好像行星环绕太阳运行一样。

那么,符号系统呢? 符号系统也有两个基本层,内层是意指,意指由客体事象的心理印迹和符号的意义组成;外层是各类符号,符号按其功能分布于各个层级,进行相应的组合。每个符号的表层是物质形式能指和意识形态所指的结合体,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功能和意义。意指是符号系统的核心层,它不断向外层符号运动发射能量,通常情况下核心层意指的“能量”和外层符号的“能量”是平衡的,构成符号得以建立和在社会传播中发挥作用的稳定基础。这跟原子核的情况相类似。“能量”是一个比方说法,能量平衡的意思是指符号外在形式——能指包裹下的所指意义跟在意指的直接意义之间存在直接对应的联结关系。但符号运动中始终有人类心理印迹的参与,使符号意义处于浮动状态。符号内核心理印迹的参与相当于原子核能量的释放,使外层符号的所指发生变异,产生“浮动的意义”。心理印迹使符号的意义产生分化,分化为跟外层所指意义对应的直接意指和跟外层所指意义发生偏差的非直接意指——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也叫隐喻意指)。心理作用越大,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的能力越强,就使外层符号的原有意义变得越弱(略相当于原子核外层的电子衰变)。随着心理印迹巨大作用的不断加强,内核意指的能量不断向外层释放,外层符号离原有意义越来越远,甚至最后蜕变为新的符号。传播符号的运动跟原子运动何其相似乃尔! 它始终在平衡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形成新的变化机制,符号不断创生,规则不断创新,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人类认知域不断扩大的无限的知识圈。

记得小时候,我家乡上海市郊青浦县重固镇北有座小山,其实算不上是什么

山，只是小土丘而已。我和我的童友们常常做爬“山”游戏，捉迷藏、放野火，以此为乐。据说山上有座庙，很久以前庙里有个姓薛的道士，很有法术。人们便把这座小“山”称为薛道山。有人说这山上以前长满桃树，结满甜美的雪桃所以叫“雪桃山”。因为山体形如颠覆的小船，所以也叫它“覆船山”。当地文人以其名不雅，谐音雅称为“福泉山”。时隔 50 年，我返回家乡重游故地，发现此“山”已被铁丝篱笆围住，触及感官的已非童稚眼中所记，仅是荒秃的土丘。有一简陋的牌楼，匾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泉山墓地”。同一地方，先后出现四个不同的名称！名称就是符号，符号所指的直接意指——直指意义没有变，都是直指同一个地方。但是，随着符号能指形式的变化，符号内核的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使所指意义产生了浮动，“薛道山”与姓薛的道士曾建庙于此有关联，“雪桃山”与当地物产有关联，“覆船山”与此不是山的“山”的形体有关联，这是间接意义；“福泉山”之名则与此“山”的出处、形体无关，“山”既无泉水，亦未降福于当地百姓，完全是一种联想意义——反映了我的故乡人民几百年来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是，1982 年新的发现对原先的命名符号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原来家乡的那片“山”根本不是山，竟是 5000 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的高台墓地。符号在远离自身的直接意指后经过联想的隐喻，从“薛道山”“覆船山”到“福泉山”，最后能指发生急剧衰变，形成了新的符号——“福泉山墓地”。据说原始上海人就是从这片土地开拓进取的。虽然这个新符号对应的客体事象没有变，但是它的直接意指变了，地方仍然是原来的，不是“山”而是“墓地”。有意思的是，当地老百姓也包括我，仍喜欢叫它“薛道山”。“福泉山墓地”这个新符号，也许将引发我无限遐想，不知“墓地”这个古文明的发源地，能否真实地给家乡的农民带来幸福的源泉。

符号的生命运动就是这样微妙，它以可感知的能指形式给人以常识，又以直接意指的方式给予人们超越常识的科学知识，进一步又以内在的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启迪人们去遐想，去畅游符号世界——那里有非语言的传播，有无比优美和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也有无比深奥和充满考验的科学神殿。我在现代传播活动的符号世界里畅想，漫步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享受符号之美和意指之美。本著正是个人在心灵享受之余的心得，愿奉献给读者，并祈赐正。

是识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北京葫芦胡同。

余志鸿

目 录

绪论 符号学的创建及其影响	1
0.1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1
0.2 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	5
0.3 结构主义与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9
0.4 符号学创建的三大影响.....	12
第1章 符号与符号中的学问	15
1.1 传播符号的重新认识.....	15
1.2 符号、征候及其他	19
1.3 语言的物化形式和意义.....	23
1.4 语言是符号世界的中介.....	28
第2章 语言、言语与符号原理	32
2.1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32
2.2 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36
2.3 语言符号的变化和新生.....	45
2.4 语言、言语和非语言符号	50
2.5 语言与书写符号.....	55
第3章 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61
3.1 符号的类型.....	61
3.2 能指的性质和划分.....	66
3.3 所指的性质和划分.....	72
3.4 符号的心理再现.....	77
3.5 符号的意指与客体事象.....	82
第4章 功能符号与符号功能	87
4.1 “实用”性功能符号.....	87

4.2 符号的双重性功能	92
4.3 符号的接合性功能	97
4.4 符号的替换性功能	101
第5章 传播符号的结构系统	106
5.1 传播符号结构的系统性	106
5.2 符号的非连续性	111
5.3 传播符号的意义和关系	115
5.4 传播符号的“类”和“对应”	119
5.5 符号三分范畴和二元组合	123
5.6 符号所指的多元联结	127
第6章 传播的符号与符号的传播	134
6.1 传播符号的意义分类	134
6.2 可推论符号与非推论符号	139
6.3 传播互动中的象征意义	144
6.4 符号传播的基本模式	147
结语	152
参考文献	157

绪论 符号学的创建及其影响

0.1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 de · Sauaaure, 1857~1913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因此而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 Robins)这样评价:“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①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给了后世学者以极其深刻的影响,英国学者莱昂斯(J. Lyons)论述说:“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②因此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于1857年10月26日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多位学者。索绪尔自幼便在这个环境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天赋,他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据说少年索绪尔就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在不满15岁时以其语言天赋撰写了一篇叫《论诸语言》的论文^③。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学习希腊语,1873~1875年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对语言学兴趣盎然,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葆朴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和库尔替乌斯(G. 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üge



图0-1

① Robins R. H., 语言学简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5.

② 戚雨村.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J]. 外国语,1995,6.

③ 赵蓉晖. 索绪尔生平事迹及其学术道路[J]. 澳门语言学刊,2004,27.

der griechischen Étymologie)。1875年,18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课程。经过近1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1876年,他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同年10月,他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他的杰出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使老一辈语言学家大为震惊。1880年秋,他离开德国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教授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和梵语等语言学课程,同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的秘书。在法国10年期间,索绪尔培养了梅耶(M·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等著名语言学家。

1891年,索绪尔离开法国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讲授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和普通语言学。1906年他出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职位,开始了三轮的普通语言学讲授。1912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肺癌。1913年2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56岁。可惜索绪尔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为自己富有创建的学术思想留下专门的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蔼(A. Sechehaye)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项工作才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学术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界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①。《普通语言学教程》先后被翻译成德、西、俄、英、日、中等国的文字,是一部经典的传世著作,成为语言学的必修课程,其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索绪尔“述而不作”的教育传播思想,而由他的弟子整理成书,颇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儒家创始人、教育传播家孔子和他弟子整理的《论语》。索绪尔以其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了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学者们提到语言学和符号学时,谁也绕不过索绪尔。

索绪尔从语言学出发,提炼出了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把语言看成是由各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成的一个结构系统。他把系统比作下棋时各个棋子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以由各种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做成,但是下棋的规则系统却总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木头的象棋棋子换成昂贵的象牙棋子,也可以换成低廉的塑料棋子,这种改变对下象棋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把围棋棋子的黑白两色改变成红黄两色,对下围棋也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们任意减少或增加象棋的棋子数目,或者任意改变围棋的棋盘格式,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下棋的

^① Holdcroft D.,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CUP., 1991.

规则——棋法。因为，棋子的质料和颜色是棋子系统外部的要素，它们一般不会影响下棋的规则；而象棋棋子的数目或围棋棋盘的格式，是这两种棋子系统内部的要素，一旦产生变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在一定规则下的棋路又可以千变万化，这些变化都必须符合棋子的组合规则。下棋的人各式各样，下棋的路子也变化莫测，但是下棋的规则却始终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中国象棋，车马炮、士象卒，将帅各率一方：马不能行象步，士不可斜飞出宫，兵不过河不准横行，炮不隔山难以发威，这就是下中国象棋的规则；至于国际象棋则另有一个路数，丝毫不允许乱套。棋子好比语言的词语符号，下棋的规则就好比语言系统的语法；词语的符号形式可以变换，但是语法必须严格遵守。

在这一系统思想的指导下，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的情况，历时语言学研究个别语言要素的演变。他又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属于全社会，是一个抽象化了的系统；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包括生理、物理和心理现象）物质化了的表现形式。索绪尔还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把语言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研究，是宏观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各种构成要素，可以说是微观语言学。所有这一切，提供了语言学研究中较新趋向的理论基础，并由此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20世纪以前的传统语言学重视语言的个性，研究语言的个别的构成成分及其特征，用“原子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语言现象；而在索绪尔影响下的20世纪现代语言学，则强调语言的共性，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及其普遍特征，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语言系统和语言现象。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语言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的语言学观念和结构主义理论：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若干基本观念，诸如语言研究的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的时空观、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以及系统中的诸多关系。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它们启动和推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和基本方向。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由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点已经成为公认的语言学研究定义。

索绪尔的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性贡献，是他在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创建了符号学(semiotics)。他指出语言是一个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个符号都有它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重性质。“能指”即语言的声音印象，“所指”即概念。他认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印象，所以语言符号纯粹是心理的。这一观念导致了符号学的创建。索绪尔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引出“符号的任意性”，并把它定为符号学的第一原则。他这样

阐述^①: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等到符号学将来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例如哑剧——是否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假定它接纳这些自然的符号,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例如那些往往带有某种自然表情的礼节符号(试想一想汉人从前三跪九叩拜见他们的皇帝)也仍然是依照一种规矩给定下来的。强制使用礼节符号的正是这种规矩,而不是符号的内在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系统中的典范,尽管语言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

为了防止人们对“符号任意性”的误解,索绪尔作了很精辟的注解:“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只有承认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我们才有可能面对事实,从零星、孤立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支撑符号的基本结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为以后各语言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为符号学的诞生提供了构思。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并归结为心理现象的同时,又认为语言研究虽然纯粹是心理的,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心理的、物理的,但是作为言语的集合——语言则是全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因此,言语只是个人对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即语言符号的规则性组合而已。这样,语言符号有可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成为“元符号”体系,用来分析和解释其他一切符号,成为符号学的基础。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年)发表了《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为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年)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

^①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103.

于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0.2 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

几乎与索绪尔同期,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查尔士·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年)也独立提出了符号学理论,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1839年9月10日皮尔士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他的父亲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著名数学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皮尔士从小接受良好的哲学和科学的训练,他能背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6岁起就学化学,12岁开始做实验,后来转学动物学。皮尔士曾在哈佛大学就读,在美国海洋和大地测量观察所任职,但一生甚不得志。1887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大学谋到一个正式的教席。在哲学上,皮尔士提出了作为实用主义核心的意义理论,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的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该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后来,他将实用主义易名为“实效主义”。在逻辑学方面皮尔士有两大贡献,一是改进了希尔代数,一是发展了关系逻辑,即引入新的概念和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在自然科学方面,先于A. A. 迈克尔逊以光波波长作为测量单位。他的大部分论著由后人整理成《皮尔士文集》。

皮尔士还是一个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年轻时的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期望这个哲学体系能够在遥远的未来,包含人类的全部学科。但他并不真的对哲学体系有兴趣,他有志建立的是一个能适应于各门学科的科学的逻辑。他在1878年1月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标志着实用主义的诞生,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他的科学逻辑的文章,但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898年詹姆士把他的哲学冠以“实用主义”的名称大力推广,人们才把他尊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他丰富的思想是在他的遗稿出版之后才发掘出来的。

在皮尔士看来,数学并不跟人类的感性直观有关,也不跟外在感性事物本体直接发生关系,数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的原始动作,经过主体活动抽象而来。计数的规定首先不是外在感性客体事物的归纳,而是从感知的具体走向逻辑的抽象。皮尔士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下,为了清理形而上学造成的混乱,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这个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一个客体的概念无非是那些效果的概念。皮尔士自称为“实效主义”。实效主义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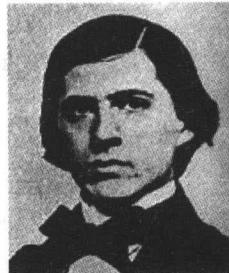


图 0-2

含义是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其目的在于清晰地阐明表征事物观念的意义，确定意义存在于效果之中。在皮尔士看来，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则无意义。在实效主义的基础上，皮尔士建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他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符号活动包括计数符号的运作，都是逻辑运动。因而符号理论也就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逻辑理论。他把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组织在三个层次上，依次是感觉活动、经验活动和符号活动。符号包括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道路上复制的具体对象和符号所产生的效果。从广义上说，符号的效果也就是符号的意义。

皮尔士符号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使他成为现代理论符号学的开启者和奠基人之一。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观是语言学方向的，那么，皮尔士的符号观则是逻辑学方向的。他的符号观对符号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着重要影响。与索绪尔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皮尔士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逻辑上，认为任何一个判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三者之间的结合。与这三项范畴相应，任何一个符号都由媒介关联物(M)、对象关联物(O)和解释关联物(I)三种关联要素构成。“媒介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能指”，“对象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所指”，“解释关联物”则是皮尔士的独特创见，它们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就存在于这种三角形关系之中。对符号类别进行划分，是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依据符号与它的三种构成要素的不同关联，将符号进一步划分为9种下位符号，由9种下位符号的相互结合构成10种主要符号类别，它们反映出符号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不无巧合的是，皮尔士与他的同时代人索绪尔一样，都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也都将语言学看成符号学的标准模型。但不难看出，与索绪尔有别的是，皮尔士对运用种种标准给符号分类有着更强的兴趣。

皮尔士的现代符号学与索绪尔存在着某些不同，“对皮尔士而言，由于他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符号学的，重心是放在自然符号体系，而协议性符号是适应于自然符号体系”^①。皮尔士符号学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记号分类学思想，二是操作理论。同时，由于皮尔士在符号中增加了“解释项”，从而符号与所指客体事物之间出现了一个因解释者不同的主观因素，这样就使得皮尔士的符号系统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②。符号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对符号所作的解释或认知，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类自

① 瓦尔、郝长墀译. 皮尔士[M]. 北京：中华书局，2003：96.

② 张良林. 皮尔士的符号观述评[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